

中国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研究丛书

◎ 凌 宇 / 编

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的重构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现代文学与文化
研究丛书

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的重构

◎ 凌宇 / 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的重构/凌宇编.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81081—196—7

I. 现 ... II. 凌 ... III. ①现代文学—文艺思潮—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艺思潮—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631 号

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的重构

凌 宇 编

责任编辑: 李 阳

责任校对: 全 健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 15.875 印张 357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1—1800 册

ISBN7—81081—196—7/I·010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现当代文学与区域文化

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 凌 宇 (2)

从民族古井里汲取新鲜泉水 凌 宇 (27)

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 凌 宇 (41)

经世致用与浪漫情致

——湖湘文化与现代小说创作 颜 雄 (57)

不露形迹的补救

——区域风俗对当代小说政治化倾向的消解

..... 田中阳 (70)

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判

..... 岳凯华 (86)

论向本贵《盘龙埠》风俗描写的特色 易 瑛 (112)

第二辑 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

现代中国的浪漫诗学 罗成琰 (124)

20 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反省 宋剑华 (151)

90 年代长篇小说：个人言说与历史浮现 李运持 (175)

论后期京派文学 周仁政 (190)

文学的错位与“总体异化”理论思潮

- 析 90 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 吴培显 (213)
- 90 年代“城市小说”: 中国小说创作的新视角
 …………… 杨经建 (223)

第三辑 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谭桂林 (243)
- 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罗成琰、阎 真 (273)
- 鲁迅与墨侠精神…………… 汤晨光 (295)
- 论郭沫若早期的哲学思想…………… 卜庆华 (311)
- 传统小说艺术的现代性演进
- 论张爱玲与《红楼梦》…………… 吴 敏 (326)
-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
- 也论《四世同堂》…………… 周国良 (346)

第四辑 现当代文论与批评研究

- 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 宋剑华 (360)
- 西方影响与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构想…………… 谭桂林 (375)
- 王国维形式之美论…………… 王攸欣 (396)
- 当代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 赵树勤 (411)
- 解构与重建
- 五四文学话语模式的生成及其嬗变
 …………… 文贵良 (433)
- 现代“新女性形象”小说叙事的诗化特征… 李树槐 (468)
- 附录一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介绍…………… (481)
- 附录二 本学科点 1997 年以来主要学术著作…………… (488)
- 附录三 本学科点 1997 年以来主要学术论文…………… (491)
- 附录四 本学科点成员介绍…………… (494)

第一辑

现当代文学与区域文化

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

凌 宇

题记：借尔一方土地，呼唤八方神灵。

一、现代神话的滥觞

两千年前，当史官文学统治着北方文坛的时候，屈原以他的《离骚》、《九歌》诸篇章烛照南天，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绚丽灿烂、别开生面的一章，与史官文学合成中华民族文学的南北二重奏。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学的主体精神，是南方民族特有的内聚生命力的爆发。而这种主体精神——厚积的民族忧患意识、炽热的幻想情绪、对宇宙永恒感与神秘感的把握、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又是与它独创的神话系统并存的。在这里，神的世界同时也是人的世界。但是，对世界的把握，必须经过神的世界的中介。

秦汉以降，随着以儒家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北方文化——文学在中国的节节胜利，南方文化——文学中的神话系统逐渐解体。虽然，楚文学的独特价值不断被后来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所照亮，却终究只是流风余韵，无法重振昔日的雄风。

然而，近一年来，在湖南作家群中，却鼓荡起一股已非

潜在的潮流。仿佛是对楚文化——文学幽灵的呼唤，在已出现的这类作品中，远古的神话、传说，民族生活中的古老遗存，包括特有的风俗、习惯，乃至在理性世界里，长期被视为邪僻、迷信、荒诞不经的东西，正在卷土重来，从文学王国里，理直气壮地夺取自己早已失去的领地。并且，这已不是个别作家的尝试，而是一种群体自觉。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孙健忠的《舍巴日》、莫应丰的《死河的奇迹》，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蔡测海的《母船》、《古里——鼓里》，何立伟的《白色鸟》，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野猪和人》，以及聂鑫森、彭见明、叶之蓁、肖建国、张新奇等人的某些小说、散文创作，都表现出向这方面移动的趋势。这些作品，一方面各自保有与创作主体过去创作的内在联结，一方面又程度不等地实现着创作主体对自己的某种超越。并且，这种超越似乎又表现为朝某种相同方向的振动——不再完全拘泥于人物、事物外部表现形态的真实性，荒诞、神秘或魔幻色彩笼罩着作品的画幅，具有类神话或现代神话的特征；力图挣脱具体人、事存在的有限空间范围，扩大作品的人生覆盖面。尽管这些作品里的魔幻色彩浓淡不一，开掘程度有深有浅，在艺术表现上，有较为自如与带着某种生涩痕迹的区别，其共有的类神话特征，却显示出楚人浪漫情绪的复活与狂放不羁的艺术想象力的释放。一种新的文学发展背景下的神之再现。这样说有被误解为浪漫主义囊括这类作品艺术特征的危险。其实，很难用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来概括这类作品。然而，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局部因素，也照亮了过去人们感觉到却始终无法说清的湖南文学的独特风骨。不仅仅表现为作品中外部的乡土色彩，也不仅仅表现为语言的地方风韵，而是作为作家的楚人血液里永

远无法抹去的浪漫因子。

南人与北人气质上的差异，虽然早已为人们所感知，却终不过是一种直觉。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地提供着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孕育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源流。最近公布的上海输血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由人类遗传基因决定的人的血清血型，南方人与北方人有着明显的差异。以北纬 35 度左右为分界线，中华民族分为南北两大发源地^①——又进一步提供了人类遗传学的证据。精神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作为物质的人的遗传基因的差异，必然导致人的精神气质的差异。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浪漫激情多流注于南方籍作家的笔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浪漫主义作家，如诗歌创作中的郭沫若，戏剧创作的田汉，小说创作的郁达夫、废名、沈从文，都是南方人。自然，对创作主体遗传学因素的任何绝对化，都必然导致谬误。因为一个作家对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还受制于后天的文化继承。秦汉以降的南北文化的大融合，早已打破南北文化—文学继承的单向性，甚至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学，也是以南方巫鬼文化为核心，融合北方史官文化影响的产物。然而，绝对否定遗传因素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同样难以解释文学的复杂存在。30 年代，当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主流时，沈从文声称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形式”。他是明确意识到无法摆脱身上的“楚人血液”对自己创作的制约的。尽管文学的后来发展，使浪漫主义的活动

^① 参见《长沙晚报》1986 年 2 月 2 日转载《华声报》消息：《中华民族分南北两大发源地》。

领域越来越狭小，这种浪漫精神却始终未能绝迹。这在湖南作家的创作中尤为明显。孙健忠的《五台山传奇》、谢璞的《二月兰》、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莫应丰的《半月塘传奇》、谭谈的《山道弯弯》、古华的《芙蓉镇》、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孙健忠的《醉乡》、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等等，现实主义的刻画始终掩不住潜流的浪漫主义脉动。近一年来湖南文学创作出现的新势头，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楚人浪漫情绪的延伸与发展，虽然奇异，却不突兀。

强调湖南作家创作特色形成的文化与遗传基因，使我们不能不面对丹纳文学三要素的理论陷阱。丹纳是将“种族”——民族遗传因素放在首位的。这种以心理学与遗传学为核心的观点无法解释文学的复杂存在。然而，我们是在充分肯定湖南作家的创作与其他地区作家创作共有的社会主义文学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它们的差异面。可是，即使指出湖南作家固有的浪漫情绪，也无法充分说明湖南文学创作的特质，虽然这种浪漫激情在湖南作家中表现得更集中、更普遍。同楚文学的主体精神与其特有的神话系统共存一样，近一年来湖南文学创作的幻想情绪，是与它的类神话特征同时出现的。废弃多年的死河瞬间复活（《死河的奇迹》），宛如天降的原始部落女儿（《舍巴日》），生来只会说两句话并永远长不大的丙崽（《爸爸爸》），时间在古里镇突然停止运行（《古里——鼓里》），神鬼莫测捣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老狼（《老狼》），作家们在有意编造神话。这一切结合着浓郁的湘楚人生的地方色彩和语言风韵，湖南文学创作的独特风骨便鲜明地凸现出来。

这种浪漫激情与神话意识的苏醒，自有它的外部推动力。不能忽视拉美文学爆炸的巨大冲击力和由此而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与其说上述作品只是表现为对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技巧的模仿和借鉴，毋宁说魔幻现实主义促进了作家对自己民族文化—文学传统潜在优势的发现与自觉，并滋生出对民族文化背景和东方哲学意识的渴望，力图在此基础上，以平等的地位与世界文学对话。这种发现与自觉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对西方文学横向借鉴的超越，提出了对民族文化—文学纵向继承的要求。这种超越，不是对横向借鉴的排斥，而是与横向借鉴一起，画出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坐标。在这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长征中，湖南作家再次站到了前锋线上。南人的幻想情绪，湘楚一带现实人生中依然保留着的大量魔幻色彩，历史文化中楚文学奇异瑰丽的神话世界，为湖南作家提供着游刃有余的艺术感兴。

这是现代神话的滥觞。如果这一势头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那么，它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背景下，楚文学复兴运动的前奏。

二、“人”，在不断寻求自身的適切形式

神话从来就不是神话。文学创作中神的诞生、消失、复活，划出的恰恰是人的轨迹。从神的诞生到复活，是“人”的外部表现形态的复归。但这绝不是一种简单循环，它反映出文学创作中“人”的观念的更新和人的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是人学。在文学创作中，任何文学观念的更新，最终都必须通过文学作品对“人”的把握方式反映出来。文学观念的更新，在本质上是人关于自身观念的更新。

近一年来湖南作家创作中出现的现代神话的滥觞，究竟

是怎样反映了文学对“人”的把握方式的变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新文学的发展历史。

发轫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现代文学，曾有过两次人的重大发现。第一次是“五四”时期。这是承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产物，表现为对个体人格与价值的肯定与呼唤。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①然而这种发现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外部行为对压抑人性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的逆反运动。“问题小说”的一时风行，正是这一运动的表征。第二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人的阶级性的发现。这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对“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发现。到30年代初，人的阶级性成了进步文学对“人”的普遍把握方式。鲁迅给这一发现以极高评价：“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②从历史角度看，这一发现对于文学具有重大意义。它扩大了“人”的内涵，丰富了“人”的表现形态，为进一步具体把握“人”，提供了重大的理论指导。

但是，由于这时正碰上世界性“左”的文化思潮，对“人”的阶级性的把握被逐渐推到极端——除阶级性以外的一切对“人”的理解与把握，都被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遭到批判。于是，打开“人”的镣铐的钥匙反而成为镣铐“人”的桎梏。这种对“人”的把握的“左”的简单化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解放以后，不断发生的有关“文学是人学”、“典型问题”、“现实主义深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的讨论及批判运动，最终都归结到对人的属性的理解与把握。上述主张与观点，都是对“人”的单一的阶级性把握的纠偏，是在“人”的阶级性之外，战战兢兢地提出有限的人性要求和人道主义补充。

新时期文学十年发展历程，是一个对“人”的本质和表现形态的把握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体现为文学关于“人”的观念的三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三年间。这期间的文学创作，表现为文学作品中“人”的平反运动。对“人”的是非善恶功过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视为非的变成了是，善变成恶，功翻成过，一种颠倒的再颠倒。然而，引起这种变化的，更多的只是“人”的外部行为价值判断的政治标准的更移，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仍未摆脱单一的政治——阶级论的影响。无论是“问题小说”、“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触及的问题主要还是社会政治问题，揭示的伤痕是社会政治造成的伤痕，反思也多为对社会政治的反思。文学作品中的“人”，在主体上仍然只是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①而活动着。

其后的五六年间，文学创作对“人”的本质和表现形态的把握，开始摆脱单一的政治——阶级论的束缚。“人”试图找回自己的复杂存在方式，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生活“原色”引起普遍关注。在文学理论上，对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以及与此相关非庸俗社会学的社会学美

^① 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84页。

学的强调，适应着这期间文学创作的需求。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把握，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问题在于理解。这种社会关系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从时间上看，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共时的关系，抑或也包括了历时的关系？共时之中有没有历时的积淀？从其内涵着眼，这种关系仅仅是人的外部的政治、经济、伦理联系，抑或也包括了人的主体的内在精神，以及作为生活底蕴的人的各种最基本的欲望，人类自身的矛盾，支配人类与自然运行的宇宙普遍法则等等？在这期间，文学创作对“人”的把握，仍然偏重于共时的和人的外部政治、经济、伦理联系。在一部分优秀作品中，虽然已经触及到现实人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人的更丰富、更复杂的人生欲望，却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出现，并未上升为自觉的追求与把握。

从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显示这一变化的最鲜明的特征，是作家对文化背景的深情关注。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之所以在1984年文坛上尽得风流，就在于潜伏于现实人生深层结构里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这些作品里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恰当的时空表现形式，满足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感和哲学意识的渴望。在这里，“人”作为“文化的动物”^①，找到了自己新的表现形态。这里的文化，究竟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还是同时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人类全部历史——现实关系的广义文化？如果指的是前者，就必然会忽视人的政治、经济活动，对“人”的本质和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转引自《读书》1985年第8期甘阳：《人·符号·文化》。

表现形态的把握，就会以一种新的镣铐代替旧的镣铐；如果指的是后者，凡属人的社会活动全是文化活动，如黄子平所说：“从美国的航天飞机到北京街头的糖葫芦都是文化”，那么，无论作家表现什么，便都是表现了文化，那么，对文化背景的强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两难推理是一种有意的诘难。在创作实践上，那些对文化深情关注的作品，并没有表现为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割裂，对文化的实际把握，是后者而非前者。固然，人是“文化的动物”之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似乎并未增加什么，却使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中有可能被误解或忽略的应有之义，获得更明晰的表述方式，使原先潜在的历史感觉和与此相关的哲学意识得到强化。问题不在写什么才算写了文化，而在这种文化的存在方式和积淀其中的人的活动和创造方式，从中映照人的本质。也许，写任一人生现象，触处皆是文化，但并不一定具有文化意识。就像《红楼梦》触及到社会的阶级对立，却并不拥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一样。如果抹去《北方的河》中反复出现的“彩陶流成了河”这一意象，《棋王》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观照，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的型范，是不难想象的。

上述三次变化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的概括与抽象，任一抽象都面临着被绝对化的危机。上述概括是就文学创作的大体趋向而言的，它不否认每一次变化无法囊括的例外。而且，每一阶段的变化都潜伏着下一阶段突破的因子和对上一阶段的承袭，从而形成文学创作纷繁复杂的表现形态。新时期十年来的湖南作家群的创作，是一种反映上述三次变化的典型形态。正如一位湖南作家所说，十年来的文学竞争，最初是拼作家的政治胆识，接着是拼作家的生活积累，现在是

拼作家的知识结构。这一说法较简明地反映出上述三次变化各自对创作主体提出的要求。

近一年来湖南文学创作出现的新势头，是怎样鲜明地贯串着被唤醒的文化意识啊！在作家笔下的类神话世界里，远古传说、民族古老遗存、民风民俗，显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环境因素起着烘托作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创作主体认知，并直接渗透到作品中“人”的主体气质中。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以明确的文化意识拥抱古老的民风遗存。五个女子的乐死轻生——对现实世界痛苦的体验与对幻想世界欢乐的向往的产物，是直接从人神相通的文化氛围中孕育而出的。韩少功在《爸爸爸》、《归去来》中，沿着民族世代延续的人生环链，为现实人生中存在的民族劣根性——那“苍老的遗传”，寻找积淀其中的文化基因。蔡测海《母船》中三代人“闯卯洞”的生命历程，分别与封闭、半封闭、开放三种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结——不同文化背景规定着“人”的气质差异。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展示的荒诞的小市民人生世界里，厚积着民族落后的文化因子。孙健忠的《舍巴日》揭示的独眼老惹和他的儿子们及媳妇掐普三种人的矛盾冲突和人生哀乐，植根于原始文化、小农社会文化、经济改革后出现新的社会文化三种不同文化形态的交织中。这种文化意识的自觉与孙健忠自己的《醉乡》恰成一种对比。在《醉乡》里，老乔保是一个世界，天九是一个世界，贵二又是一个世界。在客观上，他们无疑与不同的文化背景相联结。但作者更多地注意到的，是人物的性格差异和由此产生的冲突，积淀在人物性格中的文化差异并未被作家明确意识到。而大量民风民俗的描写多成了一般的环境渲染。在《舍巴日》中，作为特定文化形态产物的民风民俗，

确定地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原始部落女儿掐普，与《醉乡》里的老乔保属于同一文化世界，但老乔保的文化本质只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并带有对前辈作家笔下艺术形象借鉴的痕迹。而那个原始部落的女儿——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却由作家明确意识到的原始文化的精灵凝聚而成，并真正成为孙健忠的艺术独创。我们无意比较《醉乡》与《舍巴日》的孰优孰劣。也许，在整个艺术构成上，《醉乡》反显得更成熟些，《舍巴日》则带着从现实世界描绘向类神话世界描绘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某些生硬痕迹。但《舍巴日》却显示出《醉乡》不曾出现过的新的艺术活力。

三、照亮神话的现代理性之光

在外部表现形态上，神话与鬼神迷信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在骨子里，二者之间却横着一条不容混淆的界限。鬼神迷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与丧失，神话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与扩展。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弥漫着浓郁的神话氛围。在创作题材上，它是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的复兴。然而，这种复兴并非圣经故事或希腊神话的复印，而是借神的躯壳演人的悲欢，一种人化的神话。西方人文主义大师们重造的神话系统，是体现这一时期西方人的本质力量的“符号的宇宙”^①。无论今天对此作何评价，其内涵的人本主义光辉，曾照亮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迄今为止西方社会的立国之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故事新编》借神话、传说和历史重造的神话世界，同样凝聚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内聚的生命

^① 恩斯特：《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